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编

崇文丛书之五

古物文明

主 编 石兴邦
彭树智
副主编 刘善继
陈全方

陕西人民出版社

《崇文丛书》再序

1998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隆重推出了《崇文丛书》第一至四卷,即《史学论丛》、《晚华集》、《存真录》、《太华松韵》,当时我为该丛书写了序言。现在推出的第五、六卷即《古物文明》和《翰墨丛谈》,较之上次已过去了三年,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需要对原来的序言作一修改充实。

自《崇文丛书》第一至四卷出版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又给省文史研究馆聘任了20余名文史馆员,使馆员总数达到123名。这次聘任的突出特点:一是改变了文物考古界馆员偏少的局面,使之与陕西作为文博大省的地位相适应;二是增加了从西北大学文史教授中选聘馆员的数量,使西大、陕西师大这两所文史专业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高校中的馆员分布大体均衡;三是扩充了书画馆员的数量,使其阵容能反映陕西书画界的整体水平。在筹划编辑《崇文丛书》一至四卷时,我们就征集到一批有关文物和书画方面的稿件,而这批新馆员的加盟,使我们有能力、有可能,将《古物文明》和《翰墨丛谈》作为《崇文丛书》第五、六卷推出来。

自古以来,三秦大地物华天宝,独擅形胜。“八百里秦川文

武盛地，五千年历史古今名城。”这副名联就生动地道出了陕西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人文初祖炎、黄二帝的文明发轫，十多个封建王朝千余年的建都业绩，以及现代史上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十三年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都在这块黄土地上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文物遗存。加之陕西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孕育出了一大批文史研究的专门人才。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就立足在这个坚实的根基之上，她是人民政府礼贤下士之所，名流硕学荟萃之地。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馆员学者们不顾年事已高，精神焕发，盛世写春秋，余热献四化，笔耕不辍，编史修志，著书立说，吟诗填词，泼墨丹青，在文史研究、书画创作、文史资料征集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为了充分发挥这批人才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在全体馆员和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下，从1996年开始，经过连续六年的努力，集中反映馆员学者研究成果的文集——《崇文丛书》一至六卷，终于在新世纪到来时全部与读者见面了。《史学论丛》、《晚华集》、《存真录》、《太华松韵》，分别从史学、语言文学、文史资料和格律诗词方面展示了馆员们的学术实力和研究成果。这次续出的《古物文明》，汇集了馆员从事考古发掘、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内容大体上分为五部分：有关于西周宫殿、秦人都城、统万城等古遗址方面的文字；有秦公墓、始皇陵及其陪坑兵马俑、铜车马等古墓葬方面的评介；有商周青铜器、法门寺地宫珍宝等古器物方面的文章；有关

于古籍版本、碑石考订等古文献方面的论述；还有通过研究文物，讨论东西方文明交往和融合的文章。《翰墨丛谈》则汇集了馆员在中国书画艺术理论研究方面的论述，以及个人艺术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内容大体分为三个方面：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历史发展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对中国书画发展史上著名书画家艺术风格的探讨；馆员个人的艺术经历及经验总结。特别是选编第五、六卷时增加了必要的配图，这既突出了后两卷的特色，也收到了图文并茂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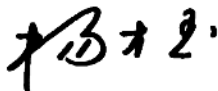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的形成有个发展过程。最初提出编写出版新书计划时，只拟出馆员“文选”和“诗选”两书，但征稿结果，文章数量之多出乎预料。为了比较全面地展示馆员的研究成果，遂决定出版《崇文丛书》，按文章类别，先出史学、语言文学、文史资料、格律诗词四卷，之后又续出文博和书画两卷。这套丛书是馆员的集体创作，由馆员自选自编，并担任各分卷的主编和副主编。馆员们的热情非常之高，不顾年老体弱，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展现了奋发进取、老当益壮的精神风采。通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汇集成册。这也体现了馆员学者团结合作的精神，对进一步增强群体意识，开拓文史研究工作新局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崇文丛书》一至六卷共辑录了 91 位馆员（包括已故馆员 28 位）的各类文章 190 篇，约计 135 万字；辑录 42 位馆员的诗词作品 1141 首。丛书内容从文体来说，有学术价值较高的专题论文，有令人信服的考证、考辨文章，有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有书评、赏析、札记等知识性篇章。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国家级学术期刊、大专院校学报和省级有关杂志，在文史界产生了一定

影响,也为我馆赢得了声誉。书稿作者大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们学业有专攻,文章有千秋。有些专题性很强,论说精深,集多年研究之结晶;有些稔熟乡邦文献,偏重地方史志研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有些是泛游书海,拾遗钩沉,可以补史之阙、纠书之误;回忆资料,多属亲闻、亲见、亲历,真实可信;格律体诗词,意境深邃,格调高雅,音韵和谐,颂今怀古,感人至深。

最近,全国人民都在努力学习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重要代表之一,提升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江泽民同志对建党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可以说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和开拓者。把馆员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一贯努力的目标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我们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发挥文史馆馆员的聪明才智,为社会提供更多健康、优秀的文化产品,为陕西的崛起、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

《崇文丛书》六卷本虽力求全面反映馆员在多方面的成果,但限于水平和经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方家指正。



2001年9月19日

前 言

文物,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实物遗存,无论它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历史文化的载体,都从不同领域和侧面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华文明以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著称于世,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物华天宝,文物荟萃,堪称文物大省,已经发现的各类文物琳琅满目,举世闻名。这为我们的文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得地独宜的条件。

一般来说,学术界把文物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石窟、古器物、古文献等类。这些文物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是它们的物质属性吗?不是!它们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它们蕴藏的人文精神内涵上。《易·贲》有言:“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精神,正是人类文明的真谛,也是文物的价值所在。如果从单纯的物质属性衡量价值,许多古文物在外行人的眼中,可能是无用的“废品”;但从它们的人文价值含量看,却可能是无价之宝。这种价值具体体现在文物所反映的各时代的社会制度、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其历史、科技和艺术价值上。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聚集了我省许多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馆员中有不少人在考古发掘、文物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有的馆员还曾主持或者参与了像半坡遗址、周原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地宫珍宝等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考古发掘活动。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以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潜心研究,笔耕不辍,写下了许多学术观点新颖、文风朴实无华的文章。我们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奉献给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确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本书共选编了16位馆员的27篇文章。其中有关古遗址方面的文章涉及到西周宫殿、秦人都城、统万城、荔枝道、傜骆道等;古墓葬方面,有关秦公墓、始皇陵及其陪坑出土的兵马俑、铜车马的文章在本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在古器物方面,如商周青铜器、传统玉器、法门寺地宫珍宝以至于瓦当、琥珀等都有专文评介;古文献方面选有关于古籍版本、碑文考证方面的文章,特别是对几通唐代墓志铭的研究,能补正史之不足,纠正史之谬误。另外,有些文章或者专门通过对“丝绸之路”枢纽地区文物的研究,论述了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从宏观上分析文物与文明的关系,或者列举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物进行评介,以说明历史上中外文化交往之频仍。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本书配有插图86幅,其中彩图15幅。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疏漏甚至差错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1年10月1日

目 录

丝路枢纽地区的文物和文明

- 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明交往 彭树智(1)
- 唐代中外交往的实物见证 魏娜娥(36)

- 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 袁仲一(47)
- 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历史意义 石兴邦(73)
- 秦始皇陵兵马俑 袁仲一(110)
- 秦始皇陵铜车马 袁仲一(145)
- 秦始皇陵形制蠡测 黄留珠(159)

- 商周青铜器举要 魏娜娥(166)
- 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 石兴邦(181)
- 玉器与中国传统文化 陈全方 陈 敏(224)
- 秦汉十二字瓦当概述 傅嘉仪(252)
- 琥珀考略 杨春霖(260)

- 唐《韦津墓志铭》考 戴应新(268)

唐俭和李渊建唐

- 读《唐俭墓志铭》 牛致功(283)
- 《张士贵墓志铭》所反映的问题 牛致功(296)
- 唐《卢绻夫妇墓志铭》考 戴应新(309)

有关白敏中的几个问题

- 读《白敏中墓志铭》…………… 牛致功(323)
- 校勘新出土唐墓志铭札记…………… 武复兴(337)
- 从古代版刻形式识别版本…………… 戴南海(344)
- 汉《仙人唐公房碑》考…………… 陈显远(374)
- 勉县武侯祠唐碑考…………… 陈显远(379)
-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述略…………… 张鸣铎(388)
- 凤雏村西周宫殿遗址与商周建筑…………… 陈全方 陈 敏(395)
- “悦骆道”初考…………… 陈显远(406)
- “荔枝道”初探…………… 刘粤基(420)
- 统万城遗址探考记…………… 毛 铸(431)

丝路枢纽地区的文物和文明

——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明交往

彭树智

阿富汗在古代是东西方陆路交通上的枢纽地区。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正确地把阿富汗看做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①。它四面受着东西方各种文明的冲击:时而是游牧世界文明火光,时而是波斯人伊朗文明的火炬,时而是希腊文明的阳光,时而是印度文明的星辉,还映射有中华文明的彩晖。这许多文明的光芒,都先后在阿富汗闪烁,并经过它不断打开古代闭塞之路。如果说文明交往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方式,那么,位于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的阿富汗,由于民族迁移和帝国战争而成为各民族文明荟萃之地,其交往也呈现出异彩缤纷的诱人的图景。众多的阿富汗遗址和文物的发现,反映了文物和不同文明交往的内在联系。

—

凡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文化的出现。研究结果证实,阿富汗存在着石器时代的远古文化^②。加兹尼省的达什基·纳乌尔发现有粗石器工具,确定为 20 万年至 10 万年以前的文化遗

存^③。此类文化遗迹还出现在阿富汗东北部的达拉伊·库尔遗址中^④。那里出土的人头盖骨碎片及山羊崇拜标志的器物,为公元前6万—前3.5万年的石器时代类型的文化遗存^⑤。旧石器晚期的片器工具,以阿富汗北部阿克·库普鲁克遗址最为集中。这里发现了2万件燧石器工具。有一件在椭圆形的石灰石上,雕刻着代表人面的头像,成为引起人们兴趣的艺术品。年代断定为公元前1.4万年^⑥。它和中国陕西大荔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石刻人头像一样,成为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石雕刻人像。如果把它同后来的头像艺术相比,也是艺术史上的趣事。

人类文化本是多元的,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总要互相接触,发生交往是必然的。交往是文化的属性。远古的阿富汗,就存在着这种文化交往。在达拉伊·库尔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山羊崇拜文化现象,反映了它同克什米尔地区及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密切联系。阿富汗最早的细石器距今一万年上下,出土于阿富汗中部地区,其特征为“没有发育几何形技术、雕刻器和琢背成分的细石叶”^⑦。这种细石器和人们在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以及中国的新疆、西藏、青海所见到的相同。因此有人推断,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的细石器有某种联系,似乎在阿富汗具有两种细石器传统相结合的文化特征^⑧,并证明了德日进在1939年提出的在新石器时代之始,北极圈邻近地区事实上存在着世界性联系性的假说^⑨,而且用更多实物完善了这个假说。

远古时期文化交往有明显的地域性。在阿富汗的坎大哈省发现的三个遗址(孟吉卡克、赛义德·卡拉和德赫·莫希拉·格洪达)都是土地肥沃、水量丰富的地区。这里出土的陶器图案装饰与邻近的俾路支和南伊朗早期文化有许多共同处。公元前

4000 年末至公元前 3000 年间,南土库曼的农耕畜牧公社与阿富汗的联系当有所加强,这可能与同一些部落群体从那里向东南方向移动有关。例如在赛义德·卡拉居民遗址发现的女性小陶俑,与南土库曼遗址中陶俑的形态相同,在彩绘陶纹装饰上也十分相似。在孟吉卡克居民遗址的文物中^⑧,发现了类似南土库曼和伊朗北部、东部的金属装饰风格。

远古文化交往的地域性特点符合文化扩散的由近及远的规律。人们的历史交往总是从邻近地区的接触开始,而文化往往就是这种接触的前哨。这主要是由于邻近地区发达文化的辐射影响所致,也与当地文化的扩散相联系,包括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阿富汗发现的许多陶器形式和装饰画的主题,可以在印度哈拉巴文化资料中找到近似的现象。除了地区邻近、可以直接接触之外,阿富汗的铜矿和青金石,对印度河谷的哈拉巴文化中心的冶金业和制陶业直接相关。尤其是蓝色的青金石,在古代东方被视为最宝贵、最有魅力的珍品,早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半期就广泛输送到美索不达米亚,甚至于埃及。当然,这是借助于多层次的商路交换^⑨。现在得到的确切资料,当时阿富汗与印度哈拉巴存在着直接的贸易和文化交往。1975 年,法国考古学家在阿姆河岸发掘的肖图尔加居民遗址的下层,出土了典型的哈拉巴式陶器。虽然这只是勘探性发掘,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古代文化紧密联系的证据。肖图尔加遗址是哈拉巴文化要素在阿姆河沿岸影响的遗存。

早期文化交往过程伴随着文明区的形成,这种文明区就是阿富汗早期农耕文化的出现。公元前 2000 年正当阿富汗南部农耕文化衰落之时,北部绿洲农耕文化形成为较高水平的文化。本世纪 70 年代苏联和阿富汗考古队在达夫列塔巴德和马扎里

沙里夫之间发现了几十个农民和畜牧者的居民定居点遗址^②，他们定居在五六个绿洲地带，这里出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物。值得注意的是各种石制印章刻饰着美索不达米亚题材的双翼狮子，许多石刻雕像上也留有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艺术风格的明显印记。这些遗物经测定，约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初，与美索不达米亚艺术时期相符^③。这里的居民可能是从邻近地区迁移而来，促进了阿富汗北部东方型文明形成的积极过程。

二

阿富汗与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新时期，是公元前 6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 4 世纪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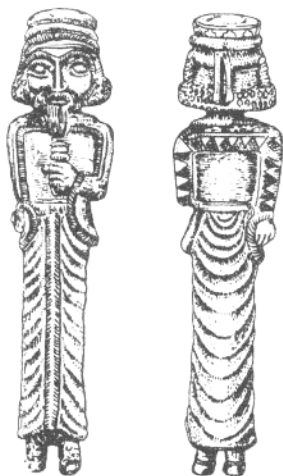
从人类历史交往角度看，阿契美尼德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试图既统治东方又统治西方的帝国。它以军事和政权的力量把东西方文明紧密地联系起来。

帝国的版图在居鲁士二世时期（约前 559—前 530 年），已扩展到从地中海沿岸到印度河、从咸海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而在“王中之王”的大流士一世时期（约前 522—前 486 年），帝国的统治进一步扩展到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

阿富汗的许多地区，如巴克特里亚（大夏）、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等地，都归属阿契美尼德帝国。在这个跨越东西方帝国的统治之下，阿富汗成为许多民族更广泛交往的地区。这种广泛的交往和经常的接触，必然在这一时期文明交往中表现出来。

研究中亚史的学者斯塔维斯基说得完全正确：“既然成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臣民，那么中亚各民族就不仅要和波斯人、米底人交往，而且也会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小亚细亚的

居民进行交往。也正是这时,中亚各民族与希腊人发生了最初的接触,不仅是作为敌人在战场上相逢,而且是作为难友——被阿契美尼德王朝驱使的建筑工匠和手艺人,乃至作为官吏和波斯军队的军人而与希腊人发生交往。”^④(见图一、二)



图一 乌浒河(阿姆河)宝藏中的
国王银塑像(正面与反
面),公元前5—4世纪。



图二 乌浒河(阿姆河)宝藏中的
金戒指(侧面与正面),公
元前5—4世纪。

作为中亚中心的阿富汗,就是阿契美尼德帝国通往东方的桥梁。在这个庞大帝国中,它同许多民族进行了频繁的文明交往。

首先是祆教文明的扩大。祆教或称拜火教,它同阿富汗有密切关系。该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在传说中被认为诞生在阿富汗的西北部。公元前6世纪,他在阿富汗的巴尔赫创建祆教,并得到阿富汗大夏国王维斯塔帕(Vishtappa)的支持,大夏宰相

娶他的小女儿为妻^⑤。在大夏统治集团的支持下,该教盛行于阿富汗及波斯。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这样的传说: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 552 年在阿富汗的巴尔赫附近,被入侵的游牧民族所杀害^⑥。总之,祆教文明的中心地区是在阿富汗,其影响辐射到古波斯而成为国教。

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奠基者居鲁士二世敏锐地看到了祆教教义中能为帝国扩张所利用的世俗面。尤其是把最高神集中为善端的“阿胡拉·玛兹达”的智慧主宰之神和恶端的“安格拉·曼纽”的凶神,以及该教强调“哈沙特拉”(尘世主宰的强权力量)的教义,使居鲁士二世最为中意。著名的祆教经典《波斯古经》(《阿维斯陀》)就是在居鲁士二世统治时期初次写下的。在居鲁士二世支持下,祆教迅速传遍了整个阿契美尼德帝国,形成了一个祆教文化圈。《波斯古经》中记载的社会组织(大宗法式的家庭、氏族、部族及上层地区统治机构),反映了阿富汗和东部伊朗的社会面貌。毫无疑问,这是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成果。

其次是与阿富汗民族有关的游牧文明的交往。现存阿契美尼德帝国征税地区名单中,保存了有价值的古民族名称的文献资料。其中提到阿契美尼德帝国东部郡中某地的巴克基伊人,研究者认为这是阿富汗部族的自称,即今日的巴什东或巴赫东^⑦。巴克基伊人与帕米尔的游牧民族塞种人为界。在这里发现塞种人的墓葬证明,他们居住在山谷中,与巴克基伊人为邻。正如现在完全或部分包括在阿富汗地域之内的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德兰吉安纳及其他地区的地名所表明,这些地区在公元前 1000 年居住着操伊朗方言的居民。这些古代东伊朗的部落也就组成伊朗民族发展的基础。这些居民移居到现在的阿富汗。在巴克特里亚语与现代阿富汗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这里

需要指出的,塞语在阿富汗语的起源中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塞种人相当早的时候就向南迁移,而后来又和其他的游牧部落迁移的浪潮一起继续迁移。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由于阿富汗民族与塞种人相邻而居,必然有更多的文明交往^⑬。操东伊朗方言的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安纳的定居居民以及讲塞语的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阿富汗民族起源有重要意义。当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相当复杂。顺便要提到的,是巴克基伊人居住在印度河流域,他们已开辟了沿河而下通往印度文明的水上航道^⑭。大流士一世为管理领地曾向这里派出了船队。

再次,文明交往的频繁,表现在物质条件的变化上。阿富汗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一些主要地区社会比较稳定。如巴克特里亚及其邻近地区,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波斯古经》中把灌溉农业看做神圣的事业。阿契美尼德帝国把巴比伦的灌溉技术和修建地下水系统(坎儿井)的方法在中亚推广。帝国鼓励农业发展,对建造坎儿井的人免去一定时期的赋税。阿富汗一系列著名的坎儿井(如法拉·格时什克地区)均修建于这个时期。绿洲地区城镇的兴起,手工业的繁荣,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发展。从印度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贸易品:镰刀、铁铲、铁锹、犁铧等铁制工具,金银装饰品、陶器、小船、小车、马车等。这说明物质文明交往相当发达。这和阿契美尼德帝国保护的“小亚细亚——巴克特里亚——印度”的商道有直接关系。帝国势力未达到之处,商业贸易也有间接通道经阿富汗开展交往。如人们认为原产于中国的桃与杏就是在大流士一世时期传到中亚的,甘蔗、柑橘和稻米,也是这时传入伊朗的^⑮。

商品关系的发展集中反映在货币流通方面。在历史文献中

记载帝国各郡的缴税,都规定用“塔兰特”币^②支付,其中巴克特里亚每年要 360“塔兰特”币。当然,这是以各种不同实物提供的货币等价物,但并不排斥部分税收是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在巴克特里亚、南格拉哈拉和阿拉霍西亚地区,还很少发现阿契美尼德帝国自己铸造的硬币金达利克(重 8.4 克)和银西克里(重 5.5 克),但发现了很多的希腊各城邦、首先是雅典的硬币。东西方文明通过货币交往在阿富汗反映出来。在喀布尔发现的古银币仓库遗物所剩无几,只有为数不多的银币被藏在博物馆^③。当时,阿富汗的南格拉哈拉也铸造地方硬币,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的银锭,上面有各种不同图案。除上述阿契美尼德、希腊和南格拉哈拉的硬币之外,在阿富汗还发现了 29 枚十分独特的硬币。从形式上看,它们近似希腊的冲模,而根据某些图案看,又像是南格拉哈拉的硬币。在这些硬币上的独创图案有:鸟、成对的山羊、象头、鬣狗等。这是文化交往中产生的一种“涵化”(acculturation,或译为“濡化”)现象^④。任何两种不同文化群体发生接触时,它们之间都可能互相摄取对方的文化要素,在涵化基线上彼此吸收所需要的要素。鸟、成对的山羊、象头、鬣狗等这些固有的文化特征,被铸在希腊冲模上,就是涵化的结果。所以,有根据地推断说,这些硬币是阿富汗的卡皮萨或巴克特里亚本地所铸造^⑤。总之,这些硬币是涵化过程中同化类型的一种表现,但也有扩散类型的要素在内。

最后,上述涵化过程最有力的证据是著名的“乌浒河(阿姆河)宝藏”。这个宝藏是塔赫季·库瓦德地方居民于 1877 年在该地的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塔赫季·库瓦德古城位于瓦赫什河与喷赤河(阿姆河上游)的交汇处,属古代的巴克特里亚。这批宝藏被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作为珍藏保存着,其中有 16 件人像雕